

领带大王为我系领带

万伯翱

上世纪80年代,国人刚刚开始穿西装系领带,将其视为正装。记得我在军队工作时,除了参加外事活动,须穿西服系领带的机会并不多。1987年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任对外宣传出版处处长时,上海出生的吾司长较明确地要求大家会见各国体育外宾时要穿西服,我忙跑到“红都”订做了两套西装,一深一浅,但领带时常打不好。

1989年,我国为首次亚运会在京举办作准备,香港“领带大王”曾宪梓(1934年2月2日—2019年9月20日)为亚运会率先捐款100万港元。他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,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

第八届、九届、十届常委,出任过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。他是一位久经沧桑的爱国老人,他的老家在广东梅县,他小时候冬天穷得连鞋都买不起,新中国成立后是靠政府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。1968年定居香港,他和夫人黄立群一起靠一把剪刀辛勤而艰苦地开拓了金氏企业,最终创下了享誉世界的领带名牌“金利来”。1978年,曾宪梓给家乡梅县捐献了30万港元,筹建了一栋“教学楼”,他一生捐赠给全国各地用于公益事业发展的善款累计高达12亿港元。当年,曾宪梓除了为亚运会捐款,还捐赠了不少衣物等,并特别捐赠了两千条“金利来”领带,那鲜红的领带前面印着“中国亚运会”和金黄的国际“奥运会五环”标志,这批领带深受广大体育界人士的欢迎。我在国家体委的办公室也收到了两大箱,本人时任处长,遂经常以此为礼物赠送来访的中外人士。

我曾在香港和内地会见过几次“领带大王”,他对我都十分热情。

1988年元旦前,我身着浅灰色西装,佩戴此鲜红领带赴香港出席香港《大公报》等新闻单位为我的文选《四十春秋》举行的首发式,曾宪梓和几位驻港的全国政协委员都应邀出席,我俩在主席台握手言欢,谈笑风生。他正值壮年,身材壮实,脸色黝黑泛着红光,普通话中带有浓重的广东口音。交流中,他惊喜地发现我胸前佩戴的这条鲜亮的中国红领带正是“金利来”,微微一笑又摇摇头:“万先生打的领带不够好啊!”说着亲手帮我解开,又往我伸出的脖子上一系,说:“要左压右,再系一次,这样结带小一点,才好看!”曾老板让我记住了领带的正确打法,以后处里、司里的同事们照此要领打领带都说好看。曾先生还说:“内地有些企业假冒‘金利来’的不少,钱让那些人都赚去了,真没办法!”第二天晚上,他又在香港马会宴请了我和国家体委宣传司吾司长及另外两位团员。我记得所有桌上的主宾大多系上了“金色五环”金利来领带。

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05年山东嘉祥县(曾子故里)举行的“曾子诞辰2510周年”集会上,当时曾宪梓后面跟了几百名曾氏后人。古稀之年的先生已经坐上了轮椅,夫人黄丽群在旁伺候着,此时的他头发虽稀疏却梳理得整整齐齐,体态明显臃肿,手脚并不利索了。我忙跑上前去,低下身子紧握着他的右手,他又加上了左手相握,我们两人四目对视了良久,贴耳说了几句问候的话。最后他提高了嗓门,深情地叮嘱我说:“许久不见了,想念你,万先生!”他上下打量着我,或许是在回忆我们十几年的交往……

2017年,简·奥斯汀去世200周年,她的头像印在了10英镑的纸币上,这说明英国人对她的喜爱程度。早在2013年7月,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·卡尼就宣布了这一消息。男性也像女性一般迷恋奥斯汀作品吗?做个调查课题,将非常有意思。

尽管奥斯汀的6部长篇小说全都看过,但还是偏爱《傲慢与偏见》。不时拿出重读的动机,一是出于女性对于浪漫爱情故事的终身欣赏;二是出于对奥斯汀出众的嘲讽艺术的膜拜性玩味。

在看小说的第二遍第三遍之后,你会很容易发现,奥斯汀是位结构大师,小说共有61章。第1章开始,是小说主人公一家生活的浪搏恩村。第27章,伊丽莎白去汉斯福看她的闺蜜夏绿蒂,夏绿蒂和傻瓜柯林斯新婚。在柯林斯的恩主、达西姨妈所住的罗新斯,女主角巧遇达西,拒绝了达西的第一次求婚。第42章,伊丽莎白跟随舅舅、舅妈去德比郡做三星期的旅行,在彭伯里遇见了一个新的达西。新的地方,新的变幻,新的心情,大师都有移景写情的本事,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。奥斯汀小说情节发生地的转换,数数页码之隔,惊叹均衡自然天成。

北欧最早的春气息来自一种黄色小花。

二月中旬的一个早晨,我俩走出蓝翅街,穿过田野、去森林散步。身边是休耕的紫色大地,看得见东面田边一幅孤零零的屋子、烟囱冒出袅袅青烟。屋里有人,有人点上了壁炉取暖。我俩的皮靴踩踏在冻着拖拉机车辙的土路上。一只乌鸦在枝丫间跳动,没叫,似乎很清楚,为夏天的约会吊嗓子的日子还早得很。此外,便没别的动静。前方、薄雾披挂,冬天依然茫茫无边。

堆着残雪的土路边,灌木只见光秃秃的枝丫。在纠缠不清的枝丫下、厚厚的腐叶上,有谁粘上了一个金灿灿的小太阳。来瑞典也几年了,我却第一次注意到这几乎匍匐在地的小黄花,酒杯般的花冠,六片花瓣,深翠的叶片如撑开的倒放的伞。浓烈的色彩带着突如其来的惊喜,刺破我身边清凉的空气。

先生告诉我,这花的瑞典文名是二字组合——“vinter”(冬)和“gäck”,gäck有“逗弄”“作弄”的意思,因为它在冬春交替

通常情况下,人们对自己第一次去过的地方,或者遇到的人,大凡只要这地方或这人稍有点故事,多会留有印象。抗战时期,在成都燕京大学,陈寅恪、吴宓、李方桂、萧公权四人曾有“四大名旦”之说,其中萧公权对此就有切身体会。只是由于后来萧去国,所以今天国内知道他的人已不多。

1920年8月下旬,清华学生萧公权乘船赴美留学。船从上海出发,经过日本时停泊一天,许多乘客便上岸去横滨和东京“观光”,萧亦在其中。虽然时间短暂,只够走马观花,但因初到日本,触目所见,也别有印象。多年后,萧在回忆录《问学课往录》中写道,横滨、东京“两市街道的整洁固不必说,人民普遍的有礼貌和守秩序,尤其给我以深刻的印象(例如坐公共电车的人也都自然地、自动地,按到来的先后在车站上排

成一列,电车来了,让车上

的乘客下车之后,才鱼贯上车,绝不拥挤挤人。这虽然‘无关宏旨’,但确是国民教育程度的一种表现”。由于现实所见,和自己以前的想象迥异,萧因此检讨道:“我此前和许多中国人一样,不大看得

知“亲”知“畏”方知强

陆其国

起‘东洋人’。现在我开始修改我的态度。”这就是萧第一次去到一个陌生且有故事的地方后,所留下的相应印象。

萧到美国后,在密苏里大学就读。当时来自远东国家在该校读书的,除了十多名中国学生外,还有来自日本、印度、菲律宾等地的学生。随着相处日久,萧渐渐发现,那些菲律宾同学学业上没有什么可圈可点,他们更热衷的,是喜欢结交美国姑娘。而印度同学则好放言高论,平

十日谈

正在重读的书 责编:殷健灵

时敢于逗弄冬天。我一下就记住了,给它起了个中文名,叫“逗冬”。

后来每年的二月中下旬,我都能见它如期而至,每每看到这夏阳般的花,不由得欢喜,并确信春天不远、夏天有盼头了。就这么确信,哪怕它正被晶莹剔透的雪包围着。

它总在最后一场雪融化前钻出地面。雪中报春,在瑞典,逗冬有舍我其谁的架势,毕竟这里没有雪里鹅黄、寒香一簇的蜡梅。也是奇了,逗冬无香,也不在枝头,却有腊黄色,有些品种黄得更浓,像能刮下一层黄油来。冬夜降温,逗冬给冻上了,次日早晨脸色有些苍白,近正午、太阳射穿云层,遂又展开灿灿的圆脸。

因为逗冬,我总觉得花是完全创造好之前,造物主跟它是有一番交谈的,让它自选哪个季节和时段、哪里开花。逗冬没和

逗冬、款冬和忍冬

王晔

事我无法想象,几个月后,眼见郁郁葱葱、繁花一片,在余下的季节里,逗冬抱着怎样的心情,如何等待来年?懊悔曾经的选择,还是能自我赞赏?四季静修只得半月至一个月寒风里的娇艳。当然,除个别幸运儿,花只开一时半会。可逗冬花期而开,很少被人摘下插在瓶里;满开后,它也凋谢,若不细细察看,枯萎的花瓣很快给冷风吹散。我从未看到一



地逗冬枯萎的模样,只觉得地上的逗冬比前几日少,继而更少了。没了黄花的逗冬叶片易被忽视,那时蓝星星的绿叶蹦出来了,绿油油的,逗冬更能不动声色地让人看不见它了。

逗冬拉丁文学名 Eranthis hyemalis, Eranthis 的意思是“早”, hyemalis 源自 hiemis,意为“冬天”,连起来,说它是越冬的早开花。这多年生草本植物出身

其他花儿扎堆、锦上添花,而是领得先遣任务。可有些

南欧等温暖地方,再蔓延到全欧洲。它的中文学名“冬兔葵”。我叫它“逗冬”是个人选择。类似花名可想到的就有款冬。在中国,十二月开花,明李时珍说:“款者至也,至冬而生花。”西晋傅咸《款冬花赋》曰:“华艳春晖,既丽且殊,以坚冰为膏壤,吸霜雪以自濡。”赞它不惧严寒。楚辞《九怀·株昭》对款冬多微词:“悲哉于嗟兮,心内切磋。款冬而生兮,凋彼叶柯。瓦砾迸宝兮,捐弃随和。铅刀厉御兮,顿弃太阿。”人在植物上投射了自己的情绪,从实用看,款冬制成的中药润肺下气、止咳化痰。

通常说的“金银花”,这名字《本草纲目》中首次出现,挺直白,说到花冠到银白到金黄的变化,又有“金银”的好彩头。此前叫“忍冬”,说叶子经冬不凋,开春新叶出,旧叶脱落,隐忍一冬。冬有绿叶的不止一种,唯它得“忍冬”之名。从前的育人观念里,“隐忍”是重要修为。我家小院有忍冬贴墙,它提醒我,不单人有修为,植物也有。见贤思齐不单人跟从学,也可跟认得的植物学。



还似花间见 (中国画) 李知弥

语,而是萧认真道出的具有前瞻性告诫,也可以说是他对国人同胞的一个郑重提醒。显然,在这里究竟是“亲”还是“畏”,其实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如何正确认知历史和现实。和“知耻而后勇”这句话相似,正因为萧在这里知“亲”知“畏”方知何谓强,所以他在美留学期间,并不去顾及别人给他贴的“亲日”标签,只管认真勤奋学习。这也正彰显出了他的自强,是他对“有点畏日”一语的一个绝地反击。

萧学成归国后,念兹在兹于努力提升“国民教育程度”,先后执教于南开、东北、燕京、清华等名校,讲授西洋政治思想史

和中国政治思想史。其间当局曾几次请他出来做官,都被他婉拒。他几十年“谨守教育岗位”,只愿做一个纯粹的学人,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。抗战期间,他在成都燕大兼课,租住乡村农舍。两年后完成七十余万字的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,被教育部审定为大学用书,这也更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。可以说,萧公权用自己的躬身力行,对何谓“亲日”与“畏日”,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诠释。

一本书的奇妙之旅

陈建奇

那年得知作家李辉在苏州做讲座,我就一早坐上高铁赶赴苏州去见李辉。李辉,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,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,《人民日报》资深编辑,主要从事现代作家传记文学创作,1978年和作家陈思和开始合作研究巴金文学。



中午,和李辉老师从观前街的得月楼饭店出来,我提议到苏州古旧书店去看看淘淘,李辉老师欣然同意,李辉本来有淘书、藏书、写书之癖好。苏州古旧书店是一家有点年头的老书店,一楼是经营新版新书,二楼三楼是旧书旧杂志和一些文房四宝书画作品。我俩在三楼古籍旧书柜前,各自仔细搜索自己喜欢的所需书籍。在满满的书架上,我很意外地发现一本《巴金写作生涯》,翻看内

在无法被传递的经验中共鸣。